

收稿日期:2025-11-16

时间殖民与智能替代： 数字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探析

刘姿琨¹, 王子威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催生了数字资本, 而数字资本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深度重塑, 将剩余价值剥削推向更隐蔽、更广泛的领域。“时间殖民”是绝对剩余价值的数字化延伸, 以工作时间的隐性延长、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生活时间的商品化为特征, 仍不能摆脱固有的生理、时间极限及社会规制。“智能替代”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数字化拓展, 以数字智能替代人力劳动、重塑劳动格局、消解劳动者主体性的方式不断加大资本剥削力度, 导致利润率下降以及人际矛盾激化。数字技术的资本化运用是数字时代剩余价值生产内在矛盾的根源, 而数字时代潜力的真正释放在于超越资本逻辑, 让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数字剩余价值; 时间殖民; 智能替代; 数字劳动; 数字资本

中图分类号: F032.2;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6)05-0043-08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数字化转型”(ZKJC240303)。

作者简介: 刘姿琨(2001—), 女, 河北保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王子威(1998—), 男, 新疆石河子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5.005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的蓬勃发展, 一种以数据、算法和平台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型资本形态——数字资本——逐渐形成并对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塑力量。在此基础上, 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 数字资本打破了传统的工作时间界限, 工作时间的弹性陷阱与隐性延长机制、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化、生活时间的商品化导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工作领域向生活领域全面扩张, 生活时间乃至生命时间遭受严重的时间殖民; 另一方面, 数字资本依托新兴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人—机关系的深刻转型, 劳动者作用于工具或机器体系的劳动模式转变为智能化技术对传统工业劳动的深度替代, 造成了劳动格局的数字化重塑与劳动者主体性的消解,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演变为智能替代的模式。但是, 仍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揭示, 以“时间殖民”与“智能替代”为特征的剩余价值的数字剥削形式并不能突破劳动者的生理与时间极限, 也不能阻止利润率下降

趋势以及人际矛盾激化,其内在固有矛盾使更高社会形态的演进具有科学性与历史必然性。

一、数字剥削的学术论争与内涵界定

面对数字时代劳动的无酬性、隐蔽性等新特质,学界围绕剩余价值剥削在数字经济中是否依然存在展开核心争鸣:

主张超越马克思经典劳动价值论的学者认为,莫基于工业时代的经典理论在解释数字经济时面临解释力危机。其核心论据在于,传统剥削理论以物质生产和明确的雇佣关系为前提,而数字经济中的典型活动,如用户的浏览、点赞、分享等数据生产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玩乐性和无酬性,难以直接归类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为捕捉这一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达拉斯·W. 斯麦兹(Dallas Smythe)创造性提出“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概念,揭示了商业资本家与媒介资本家将受众的注意力作为商品打包出售给广告商的现象^[1];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则用“免费劳动(free labor)”来描述网民在互联网上自愿且无偿的内容生产活动^[2];此外,“产—消者(prosumer)”和“玩工/玩劳动(playbour)”等概念则揭示了在数字平台中消费与生产、玩乐与工作的界限已然模糊。在主张解释力危机的学者看来,这些新现象已超出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解释范畴。

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则坚决捍卫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生命力。他主张将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价值链上涉及的所有劳动形式——从ICT矿产采掘的奴隶劳动、软件工程师劳动、装配工劳动,到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数字劳动,皆纳入数字劳动范畴,即广义数字劳动。在他看来,社交媒体用户只是数字劳动的一种形式,与其他形式共同构成数字时代的全球剥削生态。他主张将数字劳动纳入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范畴,认为用户看似自由的数据生产活动,其成果(数据)却被平台资本无偿独占;同时,ICT产业链上有酬的数字产业劳动同样遭受着资本的深层剥削,其剩余价值被资本以不同形式无偿占有。在福克斯看来,这一系列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过程,数字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平台资本以数据私有化的方式无偿占有^[3]。他强调,数字剥削是资本逻辑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深化与扩展,理论要务并非“修正”内核,而是依据新现象进行当代运用与发展。

基于上述学术争鸣,可对数字剥削的内涵作如下界定:数字剥削是数字资本通过占有数据生产资料与平台架构,支配和榨取数字劳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当代剥削新形态。相较于传统工业时代的剥削,数字剥削呈现出三大新样态:

其一,剥削架构“平台—算法—数据”三位一体。平台凭借其底层算法架构,成为剥削关系的组织枢纽,数据则是凝结劳动价值的关键产品并被资本平台私有化。三者共同构成数字剥削过程中技术嵌入型权力控制与价值攫取的结构基础性基础。

其二,剥削对象泛化与隐蔽化。剥削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雇佣劳动者,而是大幅扩展为两类异质性群体:一类是平台直接雇用、外包或算法连接的显性劳动群体;另一类是在无意识或半意识状态下贡献注意力、行为轨迹与内容产出的隐性价值创造者,他们往往在玩乐中无偿贡献数据生产资料,却难以察觉自身正遭受剥削。

其三,剥削关系去劳动关系化。资本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与长期雇佣关系逐渐淡化,转变为通过算法派单的即时性、碎片化交易模式,资本平台于是得以规避传统雇主的相应责任,如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加剧了劳动者劳动与收益的不稳定性以及权益保障的困难。

二、时间殖民: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数字化延伸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通过直接延长工作日实现。数字技术的资

本化运用则提供了突破传统时空界限、进一步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手段,这一现象可被称为“时间殖民”,即:数字资本一方面通过隐性方式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占用人们的生活时间并将其商品化后转变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时间。数字资本的出现标志着资本对劳动者时间的掠夺进入了一个更为隐蔽且普遍的新阶段。

(一) 绝对剩余价值榨取的数字新形式:特征与本质

首先,数字资本通过工作时间的弹性陷阱与隐性延长机制加强剩余价值剥削。在现代社会,全网互联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劳动者足不出户便能处理各项任务。数字资本刻意营造“弹性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灵活、自主”的意识形态,劳动者无须再遵守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在受雇主监视的固定工作场所办公,节省了通勤时间,这让广大劳动者误以为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与自由;但任务驱动、线上协同办公、奖惩机制等制度设计,却促使劳动者为争夺竞争优势,心甘情愿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投入。看似弹性、灵活、自由的工作模式实则是数字资本精心设计的弹性陷阱,其剥削不再似工业资本时代那般直接与露骨,而是以更巧妙的方式实现了剩余价值的掠夺,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常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其次,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迫使劳动者时刻处于待命状态,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数字通信设备的普及、网络数据的迅捷传输以及算法对劳动量的精准分配,使得劳动者必须随时随地接受指令和调遣,时刻处于待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变得难以区分甚至完全交融,“工作生活化”与“生活工作化”的状态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作时限的边界。这不仅持续侵占劳动者的生活与休闲时间,变相延长了实际工作时长,更在无形中加剧了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损耗。马克思指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4]508}同样,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却难以享受数字技术的红利,反而被迫延长劳动时间。

最后,数字资本不断地将生活时间商品化,使不断缩减的生活时间亦转变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意味着资本将非劳动时间重新组织为隐蔽的价值创造过程,使休闲、消费乃至日常社交行为都被转化为价值增殖的环节。加拿大传播学者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提出“玩工”这一概念时指出:游戏玩家的行为介于“玩耍”与“劳动”之间,其在玩耍(打游戏)的同时无偿为游戏公司进行创意劳动,如完善游戏场景、设计关卡等,这形成了一种新型剥削形式^[5]。当下,“玩工”的工作模式更渗透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娱乐平台等领域,用户在浏览、点击、分享、评论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被平台实时捕获,并转化为优化算法、精准投放个性化广告、进行动态推送的核心生产资料,进一步促进资本再生产与剩余价值剥削。然而,用户在此过程中却完全处于无偿劳动的状态,以“玩工”的形态遭受着资本的剥削。他们的休闲娱乐时间被卷入资本增殖的循环体系中,生活时间被商品化,最终演变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新机制。

数字资本采用这些隐性、精巧的形式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其内在本质并未脱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4]269}资本追逐无限增殖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突破一切限制,实现价值增殖,其中最为关键的限制因素就是工作日的时间极限与工人的生理极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秘密在于把工作日绝对延长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极限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像狼一般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4]306}数字时代绝对剩余价值榨取的新形式,本质上正是资本在技术赋能与意识形态塑造的双重伪装下,以更隐匿的方式实现工作日实际上的绝对延长。

(二) 时间殖民的极限:生理极限、时间极限与社会规制

数字资本对时间的殖民化掠夺并非没有极限,劳动者的生理极限、客观的时间极限、社会制度的规制,构成了时间殖民的天然屏障,而资本增殖的本性则促使其不断地寻求突破限制的途径,依托数字技术的进步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渡。

工业资本时期,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受到维持劳动者再生产的限制,难以持续地进行资本积累与增殖。尽管工业资本家“像狼一般”无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但也无法摆脱劳动者生理极限的限制,使资本增殖持续进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以隐匿的方式延长劳动时间,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并将生活时间转化为一种玩工式的劳动时间,甚至连用户的睡眠时间——24小时数字监测都可成为资本掠夺数据、攫取剩余价值的对象。数字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劳动者的生理极限,让其在休息、休闲娱乐时也创造剩余价值,形成了对劳动者全天候的剥削方式。但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零工劳动者以及现代社会中时刻待命的工作模式来说,劳动者的生理极限还是数字资本无法超越的限制。而客观的物理时间极限亦是数字资本难以突破的硬约束。尽管数字资本试图将劳动者每日24小时尽数纳入资本运作的范畴,但时间本身的有限性——劳动者每日可支配的时间总量存在不可逾越的物理极限,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休息等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活动,使得平台资本不得不为争夺劳动者有限的注意力与有效劳动时间展开激烈竞争,这极大地制约了资本增殖的速度。数字时代,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固有局限性仍然无法克服。

数字资本对时间的殖民化掠夺还受到宏观层面社会制度的规制。数字资本依托平台架构及其背后的算法黑箱,蒙上“技术中立”的面纱,巧妙隐匿了传统劳资关系中资本家的具象人格,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剥削的隐蔽性与合法性。在这种情形下,以零工劳动者为代表的群体不仅深受算法霸权的宰制,更因劳动关系的模糊化与分散化,丧失了传统工业时代通过集体谈判、车间抗争等方式与资方博弈的能力,陷入系统困局而难以自拔。实际上,由算法无限度压缩时间所引致的劳动安全风险激增、公共交通秩序扰乱及社会公共隐患积聚等问题,早已溢出单纯的劳动关系范畴,不断侵蚀着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当数字资本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和掠夺演变为对劳动者身心健康乃至公共安全的持续性侵害时,其无节制的逐利逻辑便构成了对社会整体运行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社会系统必须通过制度性约束予以回应和规制。正是出于对社会基本再生产条件与治理秩序的维护,社会通过劳动基准、算法规制等法律与政策形式,将数字资本的时间汲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避免因过度压榨而导致的社会系统张力剧增与秩序失范。这种规制并非单纯出于对劳动群体的伦理关怀,更是维系社会系统韧性、保障资本与劳动关系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

时间殖民面临的生理、时间极限及社会限制,迫使资本寻求新的积累路径。在数字资本时代,以时间殖民为代表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趋近极限后,技术驱动的效率革命,使以“智能替代”为代表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资本突破瓶颈、企图持续榨取剩余价值的选择。

三、智能替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数字化拓展

在工业资本时代,资本家通过机器体系的运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机器从辅助工具逐渐演变为支配工人的力量,取代工人的活劳动,进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在数字资本时代,数字智能作为一种新机器范式出现,成为数字资本攫取相对剩余价值更有力的工具。当前,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进一步深化,形成“智能替代”这一核心剥削机制。

(一) 数字智能作为新机器范式:劳动替代与主体消解

从本质上看,数字智能仍为一种机器形式,但这种机器不再似传统机器那样仅作为人类肢体力量的延伸,而是表现出类似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不仅具备通过复杂算法处理海量数据,实现自主学习、动态适应的能力,更能主动创造内容、优化资源配置、辅助乃至驱动决策。数字智能日益成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延伸,演变为一种突破物理局限、在分布式网络中自主运行、持续进化的新型机器范式。数字资本充分发挥数字智能相较于人类智能的优势,将数字智能的升级与人类智能的降级共纳于数字资本的剥削体系之中。

首先,数字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替代传统劳动。在基础劳动领域,数字智能不断替代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高危型岗位,如物流仓储、矿井开采、农业种植等领域,大大减少了人力损耗并节省资本开支。在服务业领域,智能客服已能处理大量标准化咨询问题,并可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相较于人类劳动力来说体现出极大优势,减少了人工客服的工作量以及用工数。在专业技能门槛较高的领域,如医疗诊断、金融预测、市场分析等,数字智能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其凭借海量的数据分析与算法预测,正成为高端劳动领域的关键决策者与引导者。可见,数字智能的替代模式不仅发生在体力劳动领域,更日益渗透到知识密集型服务、高技能认知劳动与专业化工作等传统上被视为难以替代的脑力劳动领域,呈现出替代深化的趋势。

其次,数字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了劳动生产格局的极化与分裂。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数字技术的越来越智能化与人类智能的降级同步进行,技术性失业与产业后备军群体大幅增加。数字智能对传统劳动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一方面使劳动的整体流程更加碎片化,劳动降级趋势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其依托海量的数据分析与信息处理技术,以更加科学、专业化的方式架空人类决策者,使多数劳动者沦为“无脑”执行者。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低技能劳动者数量显著增加,数字资本的逐利本性致使其无限度地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减少社会保障措施。与此同时,数字智能所催生的新的就业增长点,如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复杂算法的调试、算法决策的监管等,本应成为提升劳动者技能、促进劳动转型升级的契机,但在数字资本的运作下,高技能劳动者群体不断萎缩,技术垄断加速进行。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出更加显著的“两极分化”态势:高技能、高创造性、通常对应高收入的职业岗位不断缩减并被少数人群垄断;低技能、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占比则不断增加,并产生大量失业者,且技术垄断令他们更加难以实现阶层跨越。与此同时,传统上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岗位,则呈现出数量不断减少并向低技能工作岗位转化的趋势。数字时代的劳动格局转型呈现出“能者窄化、弱者扩增”的态势,这大大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残酷竞争,数字资本家则在其中坐收渔翁之利。

最后,数字智能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日益消解着劳动者的主体性。数字智能对传统劳动的替代与改造、对劳动生产格局的极化与分裂使劳动降级趋势加剧,低技能劳动者群体显著增加。在这一趋势下,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决策能力遭遇系统性瓦解,日益沦为执行算法指令的被动执行者。例如:网约车司机不得不按照导航算法规划的路线行驶,客服人员根据AI话术推荐进行答复,普通劳动者日益依赖算法进行决策而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这种技术性规训与决策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劳动者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空心化”与“去技能化”,原本在职业实践中培养的专业判断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等核心技能,因长期缺乏主动运用与实践挑战而日渐钝化。对于高技能劳动者来说,他们虽具备较强的劳动能力,但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其能力只能被迫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却不能助力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其主体性与能动性,亦未能逃脱主体性丧失的困境。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数字资本大大加剧了劳动者主体性丧失的程度,将其深度转变为数字智能体系的“附庸”,造成当代社会的“系统性愚昧”^[6],即在技术—资本的

系统性操控下,劳动者群体在认知和行动层面日益陷入一种被预设选项支配的集体无意识与普遍麻木状态。这正是数字资本时代劳动异化在主体性维度上的深层表征。

(二) 智能化生产中的剥削强化:劳动降级与机器附庸趋势

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批判的理论为理解智能替代的剥削本质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撑。他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源于“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4]366},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关键在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劳动资料的革命”^{[4]427},即机器的广泛应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分析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单位商品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其最终目的是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劳动力贬值与劳动降级同步进行:它一方面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不断排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性工人,转而雇佣易于管理且更为廉价的妇女和儿童,以此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不断简化劳动过程,裁剪劳动的完整性,使劳动过程中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大大减弱。数字智能作为当代最先进的机器形态,是劳动资料革命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深化,其核心作用同样在于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服务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智能借助算法优化、数据驱动和无人化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与去技能化。其结果,一方面是劳动控制更加精细化,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价值的系统性贬值和劳动层级的进一步扁平化,从而使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力贬值和劳动降级问题在数字资本时代以更隐蔽、更深刻的形式存在且日益严重。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集中讨论了机器的应用对生产劳动以及资本剥削的影响^{[7]88-109}。他深刻揭示,机器的应用使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由“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转变。在形式从属阶段,资本主要通过购买劳动力的契约关系实现控制,工人尚保留传统手工劳动的自主性;而在实际从属阶段,机器大工业则将工人彻底整合进客观的生产体系,工人“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7]90},其劳动方式、生产节奏乃至身体机能都不得不服从于机器系统的强制性节奏,这意味着剥削关系深度嵌入生产过程本身,劳动者不仅出卖劳动时间,更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夺了主体性,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体系成为支配活劳动的主体,而人则异化为生产流程中随时可替换的零件。马克思的前瞻性预见深刻解释了当下平台依托智能算法的操控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形式上受平台组织调配,更在劳动过程中被算法深度控制,其劳动主体性被极大削弱,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不断加深,这是资本生产体系向自动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字智能技术将马克思所预见的“工人被当作机器体系的附属物”^{[7]91}的景象推向极致,显著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与人际矛盾的激化。

(三) 智能替代的内在危机:利润率下降与人际矛盾激化

智能替代在强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埋下了深刻的生产危机与人际关系隐患。

数字资本的生产危机主要表现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由于可变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相比于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机器等)的比重趋于下降,导致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下降的趋势。”^[8]在智能化生产条件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智能化系统本身构成了数额巨大的新型不变资本投资,数字智能的研发、维护、更新等共同构成了不变资本的巨额投入;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的核心功能在于对人类劳动的大规模、深度替代,这直接压缩了可变资本的相对比例,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公式表述

来看:假定不变资本为 c , 可变资本为 v , 剩余价值 M , 那么, 资本有机构成为 c/v , 利润率 $p' = M/(c+v) = (M/v)/(1+c/v)^{[9]}$ 。这意味着, 当资本过度投资于机器而大幅替代人力时, 资本有机构成 (c/v) 提高, 即使剥削率 (M/v) 不变, 利润率 (p') 也会因分母 $(1+c/v)$ 过大而下降。数字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是资本积累转向技术密集型与机器密集型阶段的客观趋势, 是数字资本为片面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而过度倚仗机器代替活劳动所必须付出的、不可逆转的结构性代价, 这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再者, 智能替代的生产模式加剧了人际矛盾。数字智能不仅加剧了劳动格局的两极分化态势, 使收入差距拉大, 更通过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精神暴政”, 对劳动者实施了深层次的治理与宰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数字资本不再仅仅满足于控制劳动过程, 而是进一步渗透至人的精神与情感结构, “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10], 形成一种隐蔽而系统的精神专制。这种精神层面的专制, 在激发个体进行自我剥削与相互竞争的同时, 也加剧了劳动者整体的无力感和精神异化, 使反抗情绪在压抑中不断积累。数字资本在通过“智能替代”模式强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 也空前激化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际矛盾。当前, 全球性的劳资冲突在平台经济中不断升温, 对技术垄断的批判日益激烈, 反垄断浪潮席卷全球, 与此同时, 围绕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多样化试点与探索也在持续推进。这些现象表明, 数字资本的内在危机与局限性日益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 与之相关的批判、反思与变革正在逐步深化。

四、 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本应成为解放人类劳动、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力量, 但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 却异化为“时间殖民”与“智能替代”的双重机制, 使剩余价值的榨取更为巧妙和隐蔽。然而, 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导向剥削与异化, 其社会效应并非技术自主性的结果, 而是深深嵌入特定的生产关系与制度框架之中。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4]493}, 揭示了技术的中性生产力属性与技术特定社会关系下的应用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数字技术的发展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绝对律令, 其带来的生产率红利往往被私有产权结构所捕获, 从而加剧了劳动极化与社会分配的不平等。这恰恰证明, 走出这一困境的路径不在于放弃技术发展, 而在于对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的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了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可能性。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属性与对数据要素公共性的定位, 从产权制度层面制约了依托数据与算法形成的无限私有化扩张, 为数字财富的社会共享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正在尝试将算法权力纳入公共治理的约束框架, 并通过积极的社会制度体系构筑防护网, 以缓冲技术迭代对劳动者带来的结构性冲击。这种制度安排, 并非对技术发展的阻碍, 而是对技术辩证性的自觉运用: 在释放数字生产力潜能的同时, 主动规避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异化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将促进民生改善、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根本宗旨, 让智能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1]。唯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使资本要素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才能真正挖掘并释放数字时代的巨大潜能, 实现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 [1] 斯麦兹, 杨嵘均, 操远芃. 大众传播系统: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1(9): 50-65.
- [2] 泰拉诺瓦, 杨嵘均, 曹秀娟. 免费劳动: 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3(1): 53-69.

- [3] 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39-141.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 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J]. 开放时代,2018(6):196-206.
- [6] 张一兵. 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J]. 探索与争鸣,2018(1):4-13.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0.
- [9] 闫培宇. 资本生产的数字化变革与经济危机[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0):79-87.
- [10]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6.
- [11] 李智信,吴文新. 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应用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与多维价值[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3):9-22.

Temporal Colonization and Intelligent Substit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Exploit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Surplus Value

LIU Zikun¹, WANG Ziwei²

(1. School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spawned digital capital, which, through the profound re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process, has driven surplus-value exploitation into more hidden and extensive dimensions. Temporal colonization represents the digital extension of absolute surplus value, characterized by the implicit extension of working hours, the blurring of work-life boundarie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time. However, it is constrained by inherent physiological and temporal limits, as well as social regulations. Intelligent substitution represents the digital expans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characteriz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laborers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reshaping of the labor landscap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labor subjectivity. This brings about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nd trigger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personal antagonisms. The capita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nstitutes the root cause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Its emancipatory potential lies in transcend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enabling technology to serve human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surplus value; temporal colonization; intelligent substitution; digital labor; digital capital

[责任编辑:何敏敏]